

# 人工智能时代国家翻译教育能力的要素构建与发展研究

李德超<sup>1</sup> 李 智<sup>2</sup>

(1.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 999077; 2.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500)

**[摘要]** 在人工智能时代与国家翻译能力需求的双重背景下,构建国家翻译教育能力尤显重要。本文在前人提出的国家翻译能力框架下,对三级指标国家翻译教育能力进行细化分析,建立国家翻译教育能力框架。框架中翻译教育能力包括翻译教育投入、过程和产出三个指标。翻译教育投入包括教育规划和教育师资等;翻译教育过程包括课程体系、教学手段、教学资源、过程监控与评估、实习基地等;翻译教育产出包括教师产出、学生产出和机构产出。结合框架,本研究深入探讨 AI 与国家翻译教育能力的深度结合,丰富翻译教育投入,完善翻译教育过程,提升翻译教育成果。

**[关键词]** 国家翻译教育能力;人工智能;翻译教育;职业伦理教育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58(2025)02-0025-07

## 1. 引言

本世纪初,人工智能(AI)与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翻译开创了新局面,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机器同声传译等技术百花齐放,翻译领域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出现,不仅冲击了传统的人工翻译、机器翻译、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更为翻译行业和学界带来了全新契机。GenAI 则通过快速学习人类文本、书籍、网站等资源(包括联合国多语文件等平行语料),形成数以亿计的参数,能在具体语境中产出更为流畅自然的翻译结果。人类参与的翻译活动也在不断演进:从最初的纯人工翻译,发展到机器翻译译后编辑(MTPE),再到如今的人工智能辅助译后编辑(AIPE)。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跨文化交流的扩大,都迫切需要高质量的翻译来架设沟通与传播的桥梁。中国在联合国(U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SCO)等国际组织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以来,中国在经济、贸易、金融、投资、人文等领域的对外交流需求日益显著。学界对翻译在国

家发展中的战略定位有了新的认识。李宇明(2011,2018)、戴曼纯(2011)、文秋芳等(2011)较早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国家外语能力的概念及相关框架,但当时对翻译及翻译教育的定位仍局限于外语规划或外语能力的范畴之内。实际上,翻译作为提升国家话语权和促进国际传播的重要工具,其战略意义远超语言本身。这一点在姜戎的《狼图腾》(Wolf Totem)(2008)、麦加的《解密》(Decoded)(2014)、残雪的作品《最后的情人》(The Last Lover)(2014)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的国际传播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当前,在技术大势与国家大势面前,国家翻译教育能力的方方面面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这些新技术为提升国家翻译教育能力提供了新的可能,也给翻译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GenAI 等技术可以通过智能化手段优化教学资源,提供个性化学习体验,实现教学过程的精准监控与评估;另一方面,我们需重新审视教育师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等,在保持传统翻译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强化师生技术应用能力、批判性思维和伦理意识,促进翻译教育的接续性和可持续性发展。基于此,本文将从教育投入、教育过程和教育产出三个维度,深入探讨 AI

**[基金项目]** 香港研究资助局“优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资助项目“趋同还是趋异?基于语料库的学习者口译、专业口译和非母语语言种类的多维度分析”(编号:15602621)以及“语料库驱动的限制性英语中的惯用语研究:多模态途径”(编号:15603623)。

**[收稿日期]** 2024-12-22

**[作者简介]** 李德超,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教学、语料库研究;李智,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翻译技术、翻译教学、语料库研究。

技术对国家翻译教育能力的提升路径。首先,厘清国家翻译教育能力的概念内涵与理论框架;第二,分析 AI 技术对翻译教育投入的影响及优化策略,探讨如何运用 AI 改进教育过程,赋能教育产出;最后,系统性总结在 AI 时代国家翻译教育能力的建构,与时俱进地为国家翻译教育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 2. 国家翻译教育能力的概念与定位

国内外学者在宏观分析和评估教育时,常将教育划分为教育投入(education input)、教育过程(education process)和教育产出(education output)等范畴。(Stufflebeam, 2003; Loreman et al., 2014; 曹翼飞, 王名扬, 2018; Mezzanotte, Calvel, 2023) Loreman et al. (2014)指出教育投入包括政策、物质与经济资源、课程体系、教师教育与职业发展、教学管理等;教育过程包括教学环境、教学方法、合作教育、个体教育等;教学产出包括课堂参与、学生成果、课后迁移等。Mezzanotte, Calvel (2023)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中,对 Loreman et al. (2014)的研究进行丰富与拓展。曹翼飞、王名扬(2018)指出“投入-过程-产出”是国际上较为通行的教育指标体系分析框架。Stufflebeam (2003)从评估教育的角度,将教育分为四个部分:背景评估(context evaluation)、投入评估(input evaluation)、过程评估(process evaluation)和产出评估(product evaluation),也是教育学校为通用的 CIPP 模型。这里的背景评估主要是确定要评估的教育主体、教育需求等。

在翻译教育研究领域,穆雷、李希希(2019)构建了一个四级层次的研究框架。该框架以“教、学、测”作为三个一级指标,下设教学主体、教学过程、教学资源、学习主体、学习过程、学习效果、测评对象、测评过程和测评结果等九个二级指标,并进一步将这些二级指标细化为三级和四级指标。这一框架整合了翻译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实践。文秋芳、任文、穆雷等学者通过理论建构和数据分析,系统构建了国家翻译能力的整体框架。(文秋芳, 2016; 任文, 李娟娟, 2021; 任文, 赵田园, 2023; 任文等, 2023; 穆雷等, 2023)在这一框架中,国家翻译教育能力与国家翻译研究能力、国家翻译技术研发能力一起,构成国家翻译发展能力的三个维度,国家翻译发展能力是国家翻译能力的二级指标。其中,国家翻译教育能力又可细分为翻译教育投入、翻译教育过程和翻译教育产出三个核心指标。(穆雷等, 2023: 147)

穆雷等(2023: 143)指出,国家翻译教育能力的准确定义尚未形成学界共识。本研究结合教育学与翻译教学的前人研究成果,从翻译教育投入、过程和产出三个基本指标出发,以翻译与教育两个维度展开分析,提出如下定义:国家翻译教育能力是指国家层面的翻译专业教育机构通过科学的教育规划、完善的课程体系、优质的师资队伍、先进的教学手段和与时俱进的教学资源,在理论基础、实践能力、技术应用、文化素养、专业知识和职业伦理等方面对学习 者进行系统培养,最终为国家翻译事业培养具备国际视野、适应全球化需求的复合型、高素质翻译人才的综合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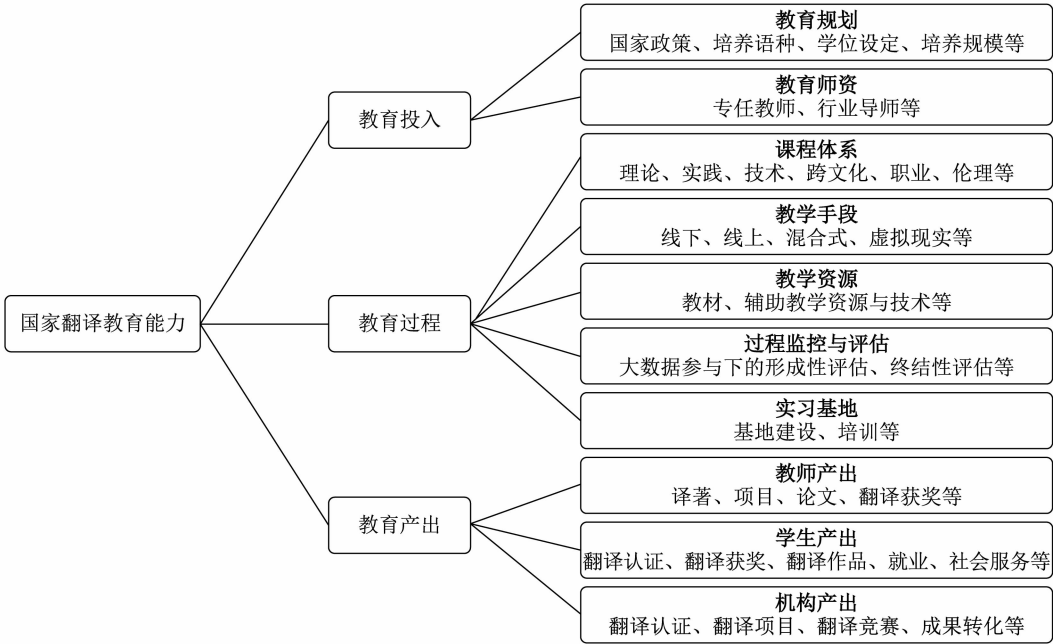
基于上述定义,在穆雷等(2023: 147)与教育学(Stufflebeam, 2003; Loreman et al., 2014; 曹翼飞, 王名扬, 2018; Mezzanotte, Calvel, 2023)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多年的翻译教学、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经验,我们发现单纯地强化翻译本身,确实可以提升学生的翻译能力,但技术与时代的双重人才要求,很难实现“一技之长,行遍天下”,只具备翻译能力而缺少专业知识、技术应用能力,难以满足社会需求,这也是垂直领域的口笔译人才尤显难得的原因。因此,我们充分考量时代与技术的需求,结合国家翻译教育与翻译实践,对翻译教育能力的三个基本指标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其中,教育投入包括教育规划(国家政策、培养语种、学位设定、培养规模等)、教育师资(专任教师、行业导师等)等;教育过程包括课程体系(理论、实践、技术、跨文化、职业、伦理等)、教学手段(线下、线上、混合式、虚拟现实等)、教学资源(教材、辅助教学的资源与技术等)、过程监控与评估(大数据参与下的形成性评估、终结性评估等)、实习基地(基地建设、培训等)等;教育产出包括教师产出(译著、项目、论文、翻译获奖等)、学生产出(翻译认证、翻译获奖、翻译作品、就业、社会服务等)、机构产出(翻译认证、翻译项目、翻译竞赛、成果转化等)(见图 1)。

在国家翻译教育能力的框架下,教育投入、教育过程和教育产出分别对应着翻译教育的不同阶段,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首先,教育投入是翻译教育的整体规划与准备环节,为教育过程和教育产出提供基础与保障。合理的教育规划和强大的师资力量能够确保科学性的课程体系和实习实训、多样化的教学及评估手段以及丰富的教学资源妥善地应用于翻译教育当中,从而为教育过程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基础。其次,教育过程是实施环节,是对

教育投入的有效验证,同时直接影响教育产出的质量。科学合理的教育过程能够最大化地实现教育投入,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师的教学效率。最后,教育产出是成果环节,标志着国家翻译教育的效果,不仅是教育过程的最终体现,也是对教育投入合理性的重要反馈。通过分析教师、学生和机构的产出,可以评估教育规划和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并为未来的教育投入和过程优化提供数据支持。因此,

这三个指标之间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循环关系,共同推动国家翻译教育能力的提升。

当前,AI、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国家教育能力框架的方方面面。这些新技术不仅为提升国家翻译教育能力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给翻译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将详细探讨如何借助 AI 技术增强国家翻译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过程、提升教育产出,从而全面提高国家翻译教育能力。



3. AI 技术助力国家翻译教育能力

翻译类课程是外语专业新技术与教育融合的主阵地,具有天然的信息技术融合基因。(刘和平,韩林涛,2022)在当前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将 AI 技术融入国家翻译教育体系已成为必然趋势。这种融合不仅有助于优化教育投入,完善教育政策,促进通用语种与小语种翻译教学的均衡发展,制定更符合社会需求的学位体系与培养方案,同时也能显著提升教育过程的效率与质量,推动教育产出的多元化发展。因此,探索 AI 技术在国家翻译教育各环节的深度应用,对提升整体教育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3.1 AI 助力拓展国家翻译教育投入

国家翻译教育投入是翻译教育发展的基石,政策引领教育发展方向,主要体现在翻译教育规划与教育师资两方面。

3.1.1 教育规划的升级转型

纵观中国翻译教育发展历程,呈现出由点及面、逐步完善的特点。以香港、澳门为例,其翻译教学虽

然起步较早,但规模化发展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香港高校于 1970 年后设立翻译系(刘靖之等,2000:XVIII),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中英双语翻译人才,为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重要的语言支撑。澳门在 1980 年代根据社会需求开设翻译专业(张美芳,王克非,2006),着力培养中葡英翻译人才,为澳门回归的政府运作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语言保障。

在内地,翻译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课程到专业的重要转变。1979 年,教育部将翻译纳入英语专业必修课程体系(穆雷,李希希,2019),标志着翻译教育的正式制度化。2006 年,教育部批准设立翻译本科专业(BTI),使翻译从附属外语专业的课程升级为独立的学科专业。200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进一步完善了翻译人才培养体系。2019 年,翻译博士专业学位(DTI)的设立,则标志着我国已形成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翻译人才培养链条。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

台,反映了国家对翻译教育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翻译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穆雷 等,2024)

进入 21 世纪,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深刻重塑着国家教育政策格局。教育部先后出台《教育信息化“十五”发展规划(纲要)》(2002)、《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2018)等政策文件,明确要求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促进智能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共享。2018 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进一步强调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2023 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多个省市出台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指南,为高校提供政策指导。作为与技术和行业发展紧密相连的学科,翻译教育更需积极拥抱这一变革浪潮,实现教育规划的转型升级。

在语种布局方面,国家翻译教育肩负着双重使命:既要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通用语种人才,又要在保护语言多样性、传承小语种文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AI 技术的引入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可能。在通用语种方面,AI 技术可以通过智能评估系统提高教学质量,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增强教学实践,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教学内容。在小语种翻译教学中,AI 技术可以帮助克服教学资源匮乏的问题,通过智能教学平台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通过机器翻译辅助工具降低学习难度,从而有效扩大教学受益面,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与国际合作。

在专业与学位设置方面,时代发展和技术革新对翻译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需要培养“懂专业、懂技术、会外语”的“三通”人才。(王立非,2018)一方面,需要积极响应“新文科”建设,开设“语言+技术”方向,培养既懂语言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这就意味着要将 AI、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本地化、技术写作、翻译技术等课程纳入培养方案,将语言教学与技术充分融合。另一方面,推进“语言+专业”的融合发展。这要求在课程设置中增加专业领域知识的比重,如法律、金融、医疗、体育等领域的专业课程。

具体而言,可在 BTI、MTI、DTI 等不同层次中实现递进式培养模式:

- (1)学士阶段注重“语言+技术”的基础融合,培养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和技术应用能力;
- (2)硕士阶段强化“语言+技术+专业”的多元整合,深化专业领域知识,提升技术应用水平;
- (3)博士阶段深化“语言+技术+专业+研究”

的创新发展,着重培养学术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人才培养规模方面,需要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根据市场需求、国家战略和技术发展态势,对培养规模进行科学调整。AI 技术可以帮助分析就业市场数据,预测人才需求趋势,为招生计划的制定提供依据。这种基于数据的决策支持,有助于摒弃过去大规模、同质化的培养模式,转而适度扩大具有专业特色和技术优势的翻译人才培养规模,确保培养的人才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行业发展、市场需求和政策导向。

### 3.1.2 师资队伍优化壮大

优质的师资队伍是翻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保障,这不仅包括专任教师,也需要吸纳行业导师。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队伍建设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就专任教师而言,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力已成为必备素养。2022 年教育部颁布的《教师数字素养》(JY/T0646—2022)行业标准明确规定了教师应具备的数字化能力框架,包括信息意识、技术操作、教学应用、创新发展等多个维度。这一标准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引,要求教师不仅要掌握基本的技术应用技能,还要具备利用技术进行教学创新的能力。专任教师只有不断更新知识结构,熟练掌握新技术应用,才能确保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实用性,进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就行业导师而言,引入翻译产业和 AI 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技术骨干,对提升翻译教育的实践性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行业导师可以开设专题讲座,分享行业发展趋势和技术应用实践;指导实践项目,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参与课程设计,提供行业需求导向的建议;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接轨翻译职业。

“双师型”教学团队的建设,不仅为翻译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接触业界、了解产业发展的机会,有效促进了翻译教育与职业需求的对接。

### 3.2 AI 助力完善国家翻译教育过程

教育过程是国家翻译教育能力的核心实施环节,涵盖课程体系、教学手段、教学资源、过程监控与评估和实习基地等多个方面。AI 技术、大语言模型等新型技术工具正以多元化的角色融入教育全过程,丰富传统教学内容,构建多样化平台,提供丰富的实训资源,实现多种教学模式的有机融合,为教学评估提供智能化支持。翻译教育过程正经历深刻变革,我们需时时谨慎,严守翻译职业与技术伦理,为

教育过程保驾护航。

3.2.1 课程体系的智能化升级

传统翻译教学主要围绕翻译理论、实践技能等核心课程展开。然而,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课程体系已难以满足新时代翻译人才培养的需求。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2020)的建议,翻译技术、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等技术类课程已成为翻译本科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课程的设置体现了对技术发展的积极响应,也反映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在技术类核心课程方面,除了传统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使用外,还可增加 AI、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本地化、技术写作等课程。近年来,随着项目管理在翻译行业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翻译项目管理、本地化工程管理等课程也逐渐成为必修内容。这些课程不仅帮助学生理解翻译产业化的运作模式,还让学生灵活掌握行业所需的管理技能。

3.2.2 教学手段、内容与评估的多元化发展

在 AI 技术的支持下,高校与企业通过独立开发或合作共建等方式,构建了层次丰富的教学辅助平台体系。这些平台包括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在线课程平台、教学辅助平台和翻译实训平台等。

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如实验空间<sup>①</sup>、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模拟联合国会议口译<sup>②</sup>)的建设,为学生提供了沉浸式的翻译实践环境。这类平台通过模拟真实的翻译场景,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积累实战经验,极大地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

在线课程平台的蓬勃发展也为翻译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大学 MOOC、Coursera、edX 等平台不仅打破了时空限制,也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广泛共享。这些平台借助 AI 技术,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行为和表现,自动调整教学内容和进度,实现个性化学习指导。

智慧教学辅助平台,如雨课堂、Classin、iSpring 的应用,大大提升了课堂教学的互动性和效率。这些平台整合了智能评分、实时反馈等功能,使教师能够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针对性指导。同时,这些平台的数据分析功能也为教学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

专业翻译实训平台的发展尤其值得关注。iTranslate、译马网、YiCat、云译客、TR – Corpus 等平台不仅提供了专业的翻译工具,还融入了智能辅助功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翻译技术。这些

平台的使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也使其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环境。

3.2.3 实践基地的智能化建设

AI 技术为产教融合开辟了新路径。高校与企业的合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实习模式,而是发展出了更加灵活和高效的协作方式。通过引入真实的翻译项目,学生可以在企业导师的指导下,运用 AI 辅助工具完成各类翻译任务。这种实践加深了学生对行业实践的理解,为进入职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智能远程实习平台的建设是另一个重要突破。这类平台突破了地域限制,使偏远地区的学生也能享受到优质的实习资源。通过这些平台,学生可以参与到跨地域的翻译项目中,接触不同类型的翻译任务,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实习效率,也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

3.2.4 教育过程的伦理考量

在国家能力框架中,我们明确指出职业与伦理是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在教学中职业与伦理教育贯穿整个教育过程,特别是在推进 AI 与翻译教育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伦理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教育者需清醒地认识到 AI 技术可能带来的偏见与歧视以及翻译职业本身的伦理需求。在教学中,不仅要在学生心中种下职业理想与伦理教育的种子,还要在具体的教学中,提供充分的职业榜样与实际的教学案例。一方面要培养学生科学、理性地使用 AI 技术,不仅要掌握技术操作,更要具备辨别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够正确评估 AI 输出结果的可靠性;另一方面,课程内容可以涵盖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知识产权等新兴议题,让职业与伦理教育落地。

通过上述各个方面的协同推进,国家翻译教育过程正在实现质的飞跃。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教学内容和方式的更新上,更体现在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的创新上,为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翻译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3.3 AI 助力推进国家翻译教育产出

国家翻译教育产出是翻译教育投入和教育过程的成果体现,是衡量教育效果的重要指标。这一指标涵盖教师、学生和教育机构三个主体的成果,构成了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在 AI 技术的助力下,各主体的产出形式和效果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3.3.1 AI 赋能教师教育产出

教师教育产出主要体现在教学研究、学术与翻译成果和教育创新等方面。

在教学研究中,教师们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

和精力来处理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而 AI 技术的引入为教师的学术产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文本处理方面, AI 技术可以快速进行文献检索、内容分析和文本对比,大大提高了研究效率。例如,在翻译研究中, AI 可以帮助教师快速分析大规模平行语料,发现翻译规律,为理论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在学术著作与翻译成果方面, AI 技术的支持使教师能更高效地完成译著写作和学术论文撰写。 AI 辅助工具可进行初步的文本润色和格式规范,帮助教师将更多精力集中在内容创新和学术思考上。特别是在跨语言学术写作中 AI 技术的辅助作用更为明显,既保证了文本的准确性,又提高了写作效率。

在教学创新方面, AI 技术为教师开发教学资源提供了新的可能。教师可以利用 AI 工具开发智能教学案例库,根据不同难度层次和教学目标,设计个性化的教学内容。同时, AI 技术还能协助教师进行教学工具的开发和优化,如开发针对特定语言对的翻译评估工具、建设专业领域的术语库等。这些创新不仅提升了教学效果,也推动了教学研究成果。

### 3.3.2 AI 促进学生翻译产出

学生翻译产出是检验教育成效的直接指标之一。 AI 技术的发展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和实践途径。通过 AI 智能化实训平台,学生可以进行个性化的翻译训练,获得实时反馈。这种即时性的评估和指导,大大加快了学习进程,提高了训练效果。特别是在准备翻译资格考试和翻译竞赛时, AI 系统可以根据考试要求和评分标准,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建议。

在社会实践方面, AI 技术为学生参与翻译实践提供了更多机会。通过翻译众包平台,学生可以接触到各类真实的翻译项目,积累实战经验。这些平台往往配备了 AI 辅助工具,既能提高翻译效率,又能确保翻译质量。同时,学生在参与这些项目的过程中,也能更好地理解 AI 工具的应用场景和限制,培养科学合理使用 AI 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在使用 AI 工具进行翻译时,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和独立判断能力。这不仅涉及对 AI 输出结果的审核和修正,更包括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文本风格的把控。学生在实践中提升了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

### 3.3.3 AI 推动教育机构产出创新

教育机构是翻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AI 技术的应用使这些机构能够更科学、更高效地履行其职责。以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

导委员会为例, AI 技术可以帮助其收集和分析大量的教育数据,包括教师表现、学生成绩、课程效果等多个维度的信息。这些数据分析结果为制定教学标准和评估体系提供了依据。

在翻译行业标准制定方面,行业协会可以借助 AI 技术进行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变化。这些信息为制定符合市场需求的行业标准,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 AI 技术还能帮助协会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使标准能够及时响应技术发展和市场变化。

翻译出版机构在 AI 技术支持下,能够高效地开展多语种出版工作,保证术语一致性、整合翻译风格、快速质检等。特别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 AI 技术的应用使得优秀文化作品能够更快速地实现多语言转换,扩大国际传播范围。

在翻译赛事组织方面, AI 技术提供了智能化的评估支持。通过训练专门的评估模型,可以为评委提供初步的评分参考,提高评审效率和公平性,如全国口译大赛、全国翻译技术大赛。同时, AI 系统还能够从多个维度分析参赛作品,为评价提供更全面的数据支持。

总的来说, AI 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国家翻译教育的产出模式。它不仅提高了各主体的产出效率,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产出形式的创新和质量提升。

## 4. 结语

本研究在前人成果基础上系统梳理国家翻译教育能力的理论框架,在教育投入、教育过程和教育产出三个维度进行了深入拓展,结合国家大势与技术发展详细探讨了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国家翻译教育能力各维度的深入融合以及对教育的影响。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国家翻译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翻译教育能力不仅是翻译人才培养的核心体现,更是国家翻译能力的重要源泉。在 AI 技术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国家翻译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这不仅凸显了翻译教育的时代使命,也引发了我们对“为谁培养翻译人才、培养什么样的翻译人才”这一根本问题的深入思考(蓝红军,2021:22)。在这场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只有准确把握机遇与挑战,持续创新教育模式,才能不断提升国家翻译教育能力,为国家对外交流与国际传播培养更多优秀的翻译人才,为提升国家软实力作出更大贡献。

注释:

- ① <https://www.ilab-x.com/>.  
② <https://www.casrz.com/h-nd-385.html>.

参考文献:

[1] Can Xue. *The Last Lover*[M]. A. F. Wasmoen. Tra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Loreman, T., Forlin, C., Chambers, D., Sharma, U. and Deppeler, J. Conceptualising and measuring inclusive education [A]. In Forlin, C., Loreman, T. (eds.). *Measuring Inclusiv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Inclusive Education, Vol. 3)* [C]. Leeds: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14: 3-17.

[3] Mai Jia. *Decoded* [M]. O. Milburn and C. Payne. Tran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4] Mezzanotte, C. (OECD), and Calvel, C. Indicators of inclusion in education: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B/OL]. [https://one.oecd.org/document/EDU/WKP\(2023\)15/en/pdf](https://one.oecd.org/document/EDU/WKP(2023)15/en/pdf). (2023-10-25) [2025-01-03].

[5] Rong, Jiang. *Wolf Totem*[M]. H. Goldblatt. Tran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8.

[6] Stufflebeam, D. L. The CIPP Model for evaluation [A]. In Kellaghan, T., Stufflebeam, D. L.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Kluwer International Handbooks of Education vol. 9* [C]. Dordrecht: Springer, 2003:31-62.

[7] 曹翼飞, 王名扬. 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建构与阐释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8 (9): 55-61.

[8] 戴曼纯. 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1 (4): 123-131.

[9] 教育部. 教育信息化“十五”发展规划(纲要) [BL/OE].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7062/200209/t20020904\\_82366.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7062/200209/t20020904_82366.html). (2002-09-04) [2024-11-09].

[10]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通知 [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 (2018-04-02) [2024-11-10].

[11]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的通知 [BL/OE].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7062/201804/t20180410\\_332722.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7062/201804/t20180410_332722.html). (2018-04-03) [2024-11-09].

[12]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的公告 [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302/t20230214\\_1044634.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302/t20230214_1044634.html). (2022-12-18) [2024-11-10].

[13]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

[14] 蓝红军. 国家翻译能力的理论建构: 价值与目标 [J]. 中国翻译, 2021 (4): 20-25.

[15] 李宇明.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若干思考 [J]. 南开语言学刊, 2011 (1): 1-8, 180.

[16] 李宇明. 积极培育国家的外语能力 [EB/OL]. <https://yuyanzyuan.blcu.edu.cn/info/1065/1130.htm>. (2018-04-18) [2024-11-09].

[17] 刘和平, 韩林涛. 新文科背景下融合型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模式 [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2 (4): 27-33, 91.

[18] 刘靖之, 林茂荪, 金圣华. 翻译教学研讨会论文集 [C]. 香港: 香港翻译学会, 2000.

[19] 穆雷, 李希希. 中国翻译教育研究: 现状与未来 [J]. 外语界, 2019 (2): 24-32.

[20] 穆雷, 梁伟玲, 刘馨媛. 新时代中国翻译教育: 理念内涵与研究框架 [J]. 外语界, 2024 (4): 67-74.

[21] 穆雷等. 国家翻译教育能力 [A]. 任文等. 国家翻译能力研究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143-147.

[22] 任文, 李娟娟. 国家翻译能力研究: 概念、要素、意义 [J]. 中国翻译, 2021 (4): 5-14, 191.

[23] 任文, 赵田园. 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研究: 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 [J]. 上海翻译, 2023 (2): 1-7, 95.

[24] 任文等. 国家翻译能力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25] 王立非. 面向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培养复合型语言服务人才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8 (3): 5, 10.

[26] 文秋芳. 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及其评价指标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2): 23-31.

[27] 文秋芳, 苏静, 静艳红. 国家外语能力的理论构建与应用尝试 [J]. 中国外语, 2011 (3): 4-10.

[28] 张美芳, 王克非. 澳门翻译的历史与现状 [J]. 中国翻译, 2006 (1): 39-43.